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鹰猎文化演进研究

张书琛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1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5年2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5年3月6日

摘要

鹰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形式, 其历史绵延数千年, 却在近百年间因社会变革与技术迭代逐渐式微, 成为亟待梳理的文化遗存。本研究基于文化传播学理论框架, 结合符号学、媒介环境学及文化记忆理论, 系统考察鹰猎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 剖析其传播机制与社会动因。研究发现, 鹰猎文化的兴衰不仅是民族精神强弱的映射, 更受到媒介技术革新、权力结构变迁与文化认同重构的多重影响。通过解析不同历史时期鹰猎文化的传播路径与符号意义, 本文揭示其从生存技艺向象征符号转型的文化逻辑, 并探讨其在当代数字化语境下的传播困境与活化路径。

关键词

鹰猎文化, 文化传播, 符号学, 媒介环境, 民族认同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alconr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Shuchen Zh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an. 22nd, 2025; accepted: Feb. 27th, 2025; published: Mar. 6th, 2025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alconry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but it has gradually declined due to social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and has become a cultural remains to be sorted out urgent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cience, combining with semiotics, media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cultural memory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awk-hunting

文章引用: 张书琛.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鹰猎文化演进研究[J]. 新闻传播科学, 2025, 13(3): 280-283.

DOI: 10.12677/jc.2025.133042

culture, and analyzes it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social moti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falconry culture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strength of national spirit, but also influenced by the innov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change of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By analyzing the transmission path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hawk-hunting cul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ultural logic of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survival skill to symbolic symbol, and discusses its communication dilemma and activation path in the contemporary digital context.

Keywords

Falconry Culture,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miotics, Media Ecology, National Identity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汉族鹰猎活动的历史演进与传播机制

1) 兴起：作为生存实践的鹰猎

鹰猎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史记·李斯列传》载：“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此句印证秦代已存在成熟的鹰猎技术。《后汉书》中曹操以“养鹰”喻吕布，强调“饥则为用，饱则飏去”，其训鹰原理与后世“熬鹰”技法高度一致，即通过饥饿驯化鹰类的野性。这一驯化逻辑表明，早在汉代，鹰猎已形成标准化技术体系。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审视，鹰猎技术的早期传播和扩散主要依赖于农耕社会特有的时空条件。在这一时期，农闲周期，特别是冬季，为训鹰活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与此同时，通过口耳相传和亲身实践的方式，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传播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冬季进行狩猎活动不仅与自然界的节律相契合——它避开了鹰类的繁殖季节，而且也符合农耕社会的经济逻辑。因为在冬季，猎物的踪迹更容易被追踪，从而可以高效地补充冬季的食物储备。基于这样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媒介环境，鹰猎文化得以在民间稳定地传承下去，并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稳定模式。

2) 发展：阶层模仿与符号化转型

鹰猎作为一种古老的狩猎方式，其符号意义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早期，鹰猎主要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驯养大型鹰类如苍鹰、金雕等，利用它们捕获体型较大的猎物。然而，随着贵族阶层的介入，猎物体型的象征价值逐渐超越了其实际的使用价值。在唐代，宫廷特别设立了“五坊”，包括雕坊、鹞坊、鸢坊、鹰坊和狗坊，这些机构专门负责猎鹰的驯养和进贡，这标志着鹰猎已经从一种生存的技艺，转变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为我们理解鹰猎的这一转型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贵族阶层通过垄断稀有的鹰种，例如名贵的海东青，以及通过仪式化的狩猎展演，将鹰猎转化为一种彰显其身份和地位的政治工具。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一只优质的猎鹰其价值可以等同于白银二十两，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猎鹰可以作为罪犯赎罪的筹码。这种稀缺性赋予了鹰猎“符号资本”的属性，使其成为社会阶层区隔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平民阶层也试图通过模仿贵族驯鹰的行为，来获取文化资本，以期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模仿行为在客观上推动了鹰猎文化的横向扩散。

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来看，鹰猎工具的革新，例如唐代发明的鹰帽，显著提升了驯鹰的效率。同时，宫廷文化与民间叙事之间的互动构建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文学作品中的猎鹰意象，如唐诗中所描述的

“苍鹰画作殊，攫身思狡兔”，将鹰猎从一种实际的狩猎行为抽象化为一种精神上的象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鹰猎在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3) 繁荣：唐代媒介生态与鹰猎文化的巅峰

在唐代，鹰猎活动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媒介技术的共同作用。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波斯马球运动和西域乐舞艺术的传入，这些多元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种崇尚武力和力量的审美趋势，而鹰猎活动恰好符合这种“阳刚之美”的审美标准，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推崇；另一方面，物质媒介技术的进步，比如鹰猎专用工具的专业化制作和宫廷鹰坊制度的建立，为大规模驯养和训练猎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1]。

从传播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唐代的鹰猎活动展现出了明显的“双向互动”特征。在贵族阶层中，通过举行仪式化的狩猎活动，如皇帝亲自参与狩猎，以此来强化和宣示皇权的威严和权威；而在民间社会，通过贡鹰制度与宫廷之间进行资源的交换。这种从上至下的文化互动，不仅使得鹰猎活动成为国家叙事中的权力象征，而且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媒介环境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曾经强调，媒介的时空偏向性对文化形态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唐代，文献资料(例如《资治通鉴》)、器物(如鹰猎时使用的鹰帽)以及制度(如五坊的设立)共同构成了一个“偏倚时间”的媒介矩阵，这一矩阵确保了鹰猎文化得以跨越时间的限制，持续传承至后代。

2. 北方少数民族鹰猎对汉族鹰猎的冲击

1) 北方少数民族鹰猎的强势崛起

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对鹰猎的迷恋程度远超汉族，尤其是满族的鹰猎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海东青(满语称矛隼)不仅是满族肃慎部落的最高图腾，更是成为了其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辽、金时期，鹰猎不仅仅是一种狩猎手段，更成为了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象征。例如，辽金两国曾经因为争夺优质猎鹰而爆发过冲突，这足以证明鹰猎在北方民族中的文化地位是多么的重要。鹰猎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技能，它还承载着民族的荣誉和自豪感，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满族鹰猎的崛起体现了“文化反哺”现象。作为游牧文化的代表，满族通过鹰猎活动强化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并将其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媒介，影响了汉族鹰猎的发展轨迹。满族发明的“熬鹰”技法，强调人与鹰的精神对抗，猎手需要通过昼夜不息的驯化，使鹰对人产生依赖。这种严酷的训练方式不仅塑造了满族强悍的民族性格，也使鹰猎成为了族群认同的核心符号。在寒冷的北方，鹰猎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它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

2) 汉族鹰猎的衰落：自然与社会双重困境

从南宋开始，汉族鹰猎逐渐步入了衰落期。这一衰落既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自然原因：南宋位于长江以南，气候温暖，农作物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农忙时间较长，限制了鹰猎的时间窗口。此外，南方冬季较短，雪期不足，猎物踪迹不易追踪，且夏季杂草丛生，鹰在捕猎后易丢失，这些自然条件均不利于鹰猎的开展。社会原因：南宋以后，理学兴起，鹰猎被视为纨绔子弟的奢侈行为，逐渐失去了社会认同。与此同时，辽金统治下的汉人失去了鹰猎的自由，鹰猎成为了外来统治者压迫汉人的象征，进一步削弱了汉族对鹰猎的文化认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鹰猎逐渐从汉族的生活中淡出，成为了一段被尘封的历史。

3) 满族鹰猎的兴盛与汉族鹰猎的式微

满族对鹰猎的支持与喜爱在清代达到了顶峰。清宫鹰猎种类繁多，包括黄鹰、松子、蹠子、细熊、白熊、鹞子、鸡鹰、燕松等十几种。顺治十四年，清廷在吉林乌拉街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朝廷贡品，并设立了“捕鹰丁”负责贡鹰差事[2]。这种制度化的鹰猎管理体系，使得满族鹰猎在清代得以

蓬勃发展。在寒冷的北方，鹰猎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它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满族的鹰猎活动不仅展现了他们对自然的尊重和理解，也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传承。

相较之下，汉族鹰猎活动逐渐走向衰微。这种衰微体现在狩猎规模的缩小，以及目标猎物体型的缩小，最终表现为训鹰种类的单一化和小型化。体型庞大的金雕、苍鹰逐渐被体型小巧的雀鹰、鹞子取代，成为汉族训鹰人青睐的对象[3]。以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为目标的经济导向，逐渐转向以怡情为目标的娱乐导向。在汉族社会中，鹰猎已经不再是展示勇猛和力量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文人雅士的消遣方式，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对传统活动的影响。

从符号学视角看，满族鹰猎的兴盛与汉族鹰猎的衰落反映了文化符号的转移。满族通过鹰猎活动强化了其民族认同与政治权威，而汉族则因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的断裂，逐渐失去了对鹰猎的文化记忆。鹰猎在两个民族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和适应，以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更迭。

3. 鹰猎文化的当代传播困境与反思

1) 文化记忆的断裂与重构

满族民族对鹰猎活动的深厚情感与独特偏好，构筑了中国鹰猎文化的辉煌篇章，并将其推向了历史的巅峰。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逐步转型与变迁，鹰猎这一传统狩猎方式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枪猎技术的兴起与普及，以其高效与便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鹰猎方式。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进一步加速了鹰猎文化的衰落进程。至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玩鹰的人数急剧减少，鹰猎文化逐渐式微，几近消失殆尽[4]。

从传播学的学术视角进行深入剖析，鹰猎文化的衰落不仅是技术替代(即枪猎技术取代鹰猎方式)的直接后果，更是文化记忆断裂的深刻体现。鹰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历来依赖于特定的媒介环境与社会结构。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冲击下，鹰猎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鹰猎文化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传播渠道与受众基础，进而加剧了其衰落的趋势。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播路径

近年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显著增强，鹰猎文化这一传统形式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关注。通过纪录片、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的广泛传播，鹰猎文化得以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活力。以满族鹰猎技艺的申遗活动为例，该活动不仅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古老的文化形式，而且为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然而，鹰猎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在商业化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确保鹰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鹰猎文化的活化需要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渠道，结合现代媒介技术与传统文化实践，实现文化记忆的重构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 陈致平. 中华通史[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238.
- [2] 闻宥. 广汉所出永元八年砖跋——关于古代鹰猎的一则札记[J]. 四川大学学报, 1985(2): 121-124.
- [3] 赵正阶. 中国鸟类志[M].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238.
- [4] 周青, 王俊. 我国环境法学界的环境伦理价值审视[J]. 广西社会科学, 2008(4): 106-109.